

# 追忆梅贻琦

■ 孔令仁

抗日战争时期我有幸在西南联大读书三年，以后又在清华大学读至毕业，1954年至1955年，因为工作需要，我又在北京大学进修过两年中国近代经济史。以上三所大学都是著名的学府。梅贻琦校长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回想起来，当年对我们进行教育和上课的老师，的确是大师级的学者，师恩难忘，现就记忆所及草成本节文字，用以寄托我对他们的深切怀念。



孔令仁

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们都是西南联大的常委。但蒋梦麟和张伯苓长期住在重庆，过

问学校的事情较少，负责日常校务工作的则是梅贻琦。

因为缺乏教育经费，联大的设施可说是简陋至极。办公室和教室都是“黄土筑墙茅盖屋”，有的房顶上加一层废旧的破铁皮，就算高档次的建筑了。联大没有礼堂，重要大会

都在图书馆前的一块空地上举行，那里用砖砌有一个约一米高、二米见方的讲台。梅先生作为一校之长，经常穿一件灰色的、整洁的旧长衫在这个讲台上向全校师生讲话，因为没有扩音器，所以梅校长总是把声音提到最

响的高度。我从1942年进联大学习，曾有幸听到梅校长的多次讲话。梅校长讲话很有风趣，使人过耳不忘，所以时间虽过了半个多世纪，我还能记住他讲话的一些零散片段。

一次是关于预防传染病的讲话。有一段时期昆明传染病流行，梅校长在大会上提醒同学要注意卫生，特别是要重视饮食卫生。联大附近公路边有许多小吃摊，因公路都是土路，汽车一过尘土飞扬，食品很不卫生，但同学图便宜，经常来这里吃东西。梅校长叮嘱我们不要光顾这些小吃摊，并且郑重其事地说：你们不要以为非吃上一大勺细菌才会得传染病，不是的。细菌可能比你们大学生聪明，你只要吃上一点，它见缝就钻，钻进你肚子里再膨胀发

展，非使你得病甚至要你的命才算完，你们千万不能在细菌前面当傻瓜啊！

又一次是他讲学生到校外兼职的问题。梅校长在大会上说，人总得吃饭，学生是人也得吃饭。穷学生到外面挣几个钱解决吃饭问题，无可厚非。但要记住，在外面只能干好事，不能干坏事。我调查了一下，许多学生是在中小学兼课，或做家教，这都是好事，你们要争取干好。听说管放警报的也是咱们联大的学生，如果敌机来了，他不及时地放警报，这会造成多大损失啊！所以，你们在外面干的虽然是一些小事，但也要尽职尽责。还有，你们要牢牢记住，你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在外兼职，而是求学。联大有许多全国著名的大师，你们要认真地向他们学知识学本领，以后才能为国家干大事。

还有一次是关于躲警报的问题。梅校长在大会上说，有些同学不愿意躲警报，说昆明天上有那么多鸟，没见到鸟屎拉到谁头上，日本飞机的炸弹也不一定偏偏会落到我头上。还有的同学说，躲飞机不够英雄，不够体面。这都是错误论调。鸟是没有目的拉屎的，所以往往拉不到人头上，日本飞机是有目的投弹的，所以每次都炸塌房屋炸伤人。难道你们非等炸伤才算英雄，非等炸死才算从容就义？所以，你们以后一定要躲警报，把躲警报



1939年，梅家在昆明东寺街住所合影，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彦、梅祖彬、梅祖杉，后排左起：梅贻琦、韩咏华、梅祖彤

当做一项任务来完成。

联大创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市民无不想把他们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读书。我的两个妹妹令智和令娴、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梅校长的小女儿梅祖芬都想转到联大附中，因此同时报考了这所学校。但我的两个妹妹考上了，龙国璧却名落孙山。联大创立时龙云曾给予许多支持，结果他的女儿竟未被录取，十分生气，认为梅贻琦

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到梅校长那里去疏通。但秘书长却踌躇不动，龙云生气道：“你还站着干什么？”秘书长嗫嚅着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这一下，龙云不生气了，对梅校长更为敬佩。龙夫人顾映秋和梅夫人韩咏华更成为好朋友，两人参加社会活动，为妇女儿童办了许多好事。

梅校长还有三个女儿——祖彬、祖彤、祖杉，她们都是联大的学生，和我是同




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报告会

学。梅校长对她们要求很严，未有任何特殊照顾，也不许她们申请贷金。那时我们女同学都住在南院一座破庙的破房里，有一年我和祖杉、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以及另两位女同学，五个人住一间破房。下雨时房顶漏雨，我们就用油布把行李盖好，在屋里打着伞，坐在床上看书。

梅校长不仅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更注意学生的品德修养。那时中华民族正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梅校长就十分鼓励学生投笔从戎，参加到这场神圣的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去。联大前后培养学生约8000人左右，据统计参加抗战行列的有834人，占联大的学生的10%以上。梅校长的二女儿祖彤参加了

战地志愿医疗队。1943年，美国开始大规模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需要大批翻译，联大的应届毕业生都被征调去服务，其他班级可自愿参加。这时梅校长的独生子祖彦也在联大读书，尚未毕业，也自愿报名了，他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的滇西战场。我的姑父葛沅时任滇缅公路局局长，有一次与美国军官会谈，恰好祖彦任翻译。姑父后来对我说，祖彦才19岁，很能吃苦，他的英文很好，翻译得准确、流畅，真是难得的人才。1945年7月6日，美国总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协助美军抗战斗争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军人授予自由勋章。获奖者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共有300多人。

获奖的翻译官员中，联大学生共12名，其中就有梅祖彦。这件事是与祖彦同时获得自由勋章、现定居加拿大的联大同学姚元在来信中对我说的。

抗日战争以后，梅校长在美国定居。梅祖彦先是在美国留学，后在美国工作。1954年，祖彦费了很大周折由美返国，在清华大学任教。祖彦在回国前夕，曾与其父多次长谈。他父亲虽对政治局势看不准，有些不放心，但仍同意他回国，鼓励他为建设新中国做出贡献。这说明梅校长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把祖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孔令仁，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曾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